

我们如何扩展自己认知的边界？

Betty Leask

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 (the La Trobe University) 国际化荣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 (the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leaskb@bc.edu

最近哈吉斯 (Tamsin Haggis) 在 2009 年 6 月出版的《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4[4]: 377-390) 中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醒了我们: 我们今天对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学习的了解是我们已提出问题的直接结果, 也是我们寻找答案的地方。而且,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在何处寻找有关学生学习的答案都受到了我们的特定目的和兴趣的影响, 而这些目的和兴趣本身就是我们所处的时空环境的产物。她发现, 40 多年来, 对有限范围内可能的观点和方法的关注限制了今天我们对教与学的了解, 导致了某些结论和行动, 重要的是, 却远离了其他的结论和行动。

这与当今国际高等教育有关, 原因有二: 首先, 因为一些教学和研究一直集中在与国际学生教学有关的问题, 支持他们的学习以及包括课程国际化的问题上。第二, 因为在过去的 25 年里,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发展并成长为一个研究领域, 一个被研究和教授知识的分支, 以及关于学术论文和论文发表的领域。在这一点上, 重要的是要考虑: 我们问了什么问题? 是什么假设促使我们提出这些问题? 对我们所知道的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问了什么? 我们知道什么?

在过去的 25 年里, 我们提出了许多关于

国际化的意义和它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的问
题, 并探索和讨论了一系列不同的方法。在
此过程中, 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国际化”话
语、文化和身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社区,
我们详细讨论了全球化、全球公民身份和跨
文化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含义、可承受性和局
限性。我们创造了大量的新术语。例如, 我
们在“国际化”一词上附加了过多的形容词,
如“综合的”、“转型的”、“包容的”、“智能
的”、“强迫的”、“有意的”和“无意的”。我
们研究了国际化的各种过程——例如, 课程
的“国际化”、教学的“国际化”、国内的“国
际化”、国外的“国际化”以及“国际化的全
球化”本身。我们已经探索分析了一系列国
际化的阻碍者和推动者。我们在许多相关问
题上都有立场, 包括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招
收留学生的盈利性、大众化等。我们得出结
论, 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由不同的理论基础驱动, 高度依赖于背景,
既普遍又有争议, 并与各种各样的概念、思
想和理论相联系。我们的实践和我们谨慎论
证的立场是由学术和研究提供的。因此, 我
们可以自信地说, 在 25 年之后, 我们对高等
教育的国际化、它是如何实施的, 以及它为
个人、社区和民族国家提供的挑战和机会有
了很多了解。毫无疑问, 还有更多的东西需
要了解, 我们应该继续进行研究, 为未来提
供信息和塑造未来。

但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以及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否会受到我们在调查和讨论中所使用的个人和集体的语言以及文化资源的限制呢？我们是否因为疏忽而限制了我们认知的可能性？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作为一个社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重新转向我们一路走来所做的假设，以及这些假设将我们引向何方，我们能获得什么收获？让我通过讨论一个例子来阐明我的观点，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包括我自己）在过去10年里花了大量时间探索的。

我们如何使教师参与国际化？

这个问题驱动了大小研究项目，已经确定了参与、阻碍和推动的因素。有人认为，当教师不想参与国内外的国际化活动时，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和跨文化工作不感兴趣或缺乏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已经开发了各种策略和资源来引起教师的兴趣并发展他们的技能，许多也已经被应用和评估。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的人都知道，师资是“问题”，是国际化的主要障碍，需要“解决方案”。但是几年前，我意识到在我当时工作的拉筹伯大学（the La Trobe University）中，确实有一些教职员工深入而有意义地参与了国际化（例如与移民或土著群体合作），但是该机构未将其视为“国际化”的方式。“我把教师作为一个群体来定位，认为他们不敬业，缺乏参与的动机、知识或技能，这让我意识到，我在伤害他们，限制了我自己的知识范围。”事实上，挑战这个最基本的假设，追根溯源，重新校准我的思维，是一种解放。这使我和同事们从假设不足转向寻找不同的方式，让教师们从事国际和跨文化的工作。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不同的“地

方”，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比如“教师的参与度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认识和学习教师在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我们的论述和实践中，我们如何将教师定位为国际化的建筑师和代理人？”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从更广泛的学科领域阅读新文献，并探索关于参与的新理论和新视角。

但通过批判性反思来挑战我们自己的假设是困难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如何感知——我们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立场——是根植于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基础上的。因此，批判性反思冲击了我们身份的核心。它让我们感到脆弱和暴露，因为它不仅挑战了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东西的有效性，也挑战了我们是誰这个问题的有效性。但最终，这是一种解脱。它开辟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方面，它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教育家，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学习者，才能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实践。

国际化更广阔的领域？

那么，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更广阔的领域又如何呢？会不会是我们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群体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所进行的研究，以及我们所得出的结论，都受到了严格假设的限制？我们对自己提出问题的回答又是如何受到个人和集体的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限制的？这些语言和文化资源是由“我们是谁”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吗？作为研究人员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在年龄、种族、语言、国籍以及某种程度上性别方面相对有限。当我们主张“包容的国际化”和需要与“他者”进行接触时，我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包容的，并积极寻求在我们的领域进行研究的新想法和新方法？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同类的吗？

我们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变得太舒适了吗？我们是否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学者的想法和观点有足够深入的了解？通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足批判，我们是否已经默认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检查我们的个人和集体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并发现它们的不足，这一领域的未来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在未来的25年里，我们不仅要重新关注更多的知识，还要用不同方法

去关注，这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在他们2010年出版的关于全球化教育政策的书中，瑞兹维奇（Rizvi）和林格得（Lingard）称其为一种替代的社会想象。

所以，我回到哈吉斯提出的问题，但我问他们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我们问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假设和价值立场？我们如何扩展自己认知的边界？